



□赵瑞峰

高出(1579年—1630),字孩之,莱阳人。

明代万历二十五年,高出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任南户部主事,后任员外郎、郎中、进按察副使。后迁河南参政、进按察使、降副使,调辽东道监军,又调广宁道监军,改西平堡监军。

明代天启元年,辽阳陷入后金,高出被逮下狱,天启七年被赦。自十七八岁起,高出就喜作诗,数十年不辍,在狱五年,他作诗四卷。出狱回家后,高出辑其诗作为《镜山庵集》。

高出幼时曾在同属莱州府的即墨随师受教,这时他就看过前人所写的崂山游记,而且崂山就在即墨东仅四十里,他心向往之,但实不能至。直至明万历三十五年,早已登上仕途的高出,因缘际会得游崂山,一偿夙愿。

高出根据游崂山经历而写的《崂山记》开篇就说,他是在明万历三十五年春,因公事留驻家乡。这时他得暇欲游崂山,由于患咳嗽,经不起旅途劳累,只好向后推迟,后来选在三月初一这天游崂山。说来也怪,高出自即墨策马南行,出城后“逆郭门之风,则洒然病去体矣”。

由于高出是初次游崂山,并不识得详细路线,他特意向山野人家打听,却不得要领。他又打听去即墨鹤山的道路,总算问清楚了。

从古人所作的崂山游记可知,自北来游崂山,鹤山是必经之地,一旦来到鹤山,入崂山道路不问自明。高出迂道南行三十里,在到达鹤山前,经过一高峰,他“登高俯冥,白云摩顶,海色接天,仅如平地”。日暮时分高出才到鹤山。

高出在《崂山记》中写道:“转而蛇升碍石,则穴而梯,跻其巅。”“北山多石罅,可匍匐侧注而入。更出之,则崭然双壁,人立而绝。东有徐炼师台,无他异。”当晚,他借住在道士屋内,次日,高出“索径而南”,但见“平畴广偃,麦秀渐渐。衣袂间,清凉欲雨。”行二十五里,入往太平官,此道颇险,“步而级,膝过于颐”,行二里许,获一洞,“有道士冥栖其中。与之言,领之而已”。高出出洞西行,“经石桥,见流水潺潺而下者,从之有泓焉。空鉴须眉,岸花映发,沙轻如尘雾,称履而无迹”,高出赞其为“崂山第一水”。

第二天高出再次借住在道舍,饭后则到狮子岩观景,高出在《崂山记》这样描绘狮子岩:“中洞容数人眠。上之为明月崖,宾日也。海水在足底,虚青倾浮,一气吞吐。石动潮泊,若天吴之出奔,观奇矣。”这样观赏高出犹嫌不过瘾,他又“趋下薄视,反而望之,倒影夺目,诸峰飞越”。他认为,狮子岩变幻莫测,和在上俯视相比,“趋下薄视”迥异其趣。

高出从太平官继续南行,有左右两条道,“从左,当观尽虑慨焉;从右,则纡而不可底,且难左也。”也就是说,走左道基本能看到崂山所有景点,在询问了随同道士的意见后,高出选择了前者,他走左道继续南进,十里内尚可骑乘。

渐行,山脚便伸入大海,且山路傍海,益发难走。《崂山记》描述了这段路

之艰险:“……如转磨齿,余神悸而视他。又进之,潮激山吼,殷在地中。石错涛上,或躡或缘,殆险塞之至也。下为甚。”再向前,则柳暗花明,高出认为如进桃花源:“……多松,静而声间,覆数椽之茅。野妇乳儿,视客不异也。山花片片,杂英如红缬,袭路之芬。滩鸣谷答,沙白掩带紫蛙。茭蒲芃郁,来往翠禽。我马骎骎,如在郊野。”如此胜景,难怪高出会有“可与忘险,人其罢厌哉”的感慨。

高出再前行二十里,始达下清官,次日因下雨,他在这里住了一天。其间,高出翻阅经卷,附图显示有一个地方叫“仙墩”,就在下清官前左方二十里,高出欲前往游览。他“旦而往,出东北乘五里,即杖而南行”,一路上“径随海折,山与避就,有仄不受足者。山尽矣,又突如其来一耸,根纳海而水覆之。”高出转弯向右下行,进到一个极幽的去处,这里“海水澎湃,如鼓雷霆。乱石如马,潮荡之如白羊,飞空如鹅群……”高出赞其为“崂山第一壁”,他认为,这里群峰摆列整齐,像群星、似众仙,名叫“仙墩”很有道理。

返回下清官休息时,随同道士认为,从下清官到崂山山顶尚有三十里,且道路崎岖险峻,又不能骑马,恐高出不能承受,因而劝其放弃登崂山山顶的计划。高出却说,就是步行有何妨,不到崂山山顶还算是什么游崂山?他因此决意前往。

次日,高出“旦而往,出东北,乘五里,复杖而行十里,至上清官。有银杏树,双凸处可隐三人。”高出遂在此小憩,又吃了道士所献芋食,后又西北行十里,出天门,在一处茅庵歇息、吃饭。后往西北再行十里,而路险难走”“巨峰在上,尚可十五里,乃就庵中宿”。

第二天,高出早起后并未感到劳累,那位好心的道士再次劝他就此止游,免得出危险,但高出矢志欲登崂山山顶,并不为所动,“杖而先之”。

之前到下清官前的一段山路是靠海的,高出认为“殆险塞之至也”,然而跟登崂山山顶的这一段山路相比,高出认为可谓小巫见大巫。他在《崂山记》中说:“……里许,即不可得径,榛莽荒忽。蹈而隧之,宛委以升,绝深径……凡俯若缥缈之前峰者,以十数,乃陟焉。危乎高哉,兹山之峻极也。”高出登顶后,所见只是“风甚亦雾……诸峰罗立……如元气之无见者,出没于泰山之野而已。”除了群峰,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高出不免有遗憾。待原路返回白云庵,则“布袜如毳,履已穿矣”。可见登崂山山顶之难。

是日高出抵达下清官别庄,华楼官在下清官北六十里,高出次日便去游览。《崂山记》记载了华楼官的地理环境:“碧岩紫巘,古树浮青;列嶂排空,丹梯指掌。东有孤石植焉。霞色映之,建标擢秀,焕若金銀之台。”

高出游崂山,自三月初一始,至初十游毕,共用十天时间。他几乎游遍了崂山,且游必尽兴,尽兴则必有记,因此他的《崂山记》对崂山风光描述得淋漓尽致,在众多崂山游记中可谓上乘之作,因此能入选诸家游记选本,得以流传后世。

(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撰稿人)

故事里的沂蒙

拥军支前的英雄群体

沂蒙六姐妹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老区的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涌现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拥军支前女英雄群体,这便是“沂蒙六姐妹”。“沂蒙六姐妹”的名字分别是: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让我们回到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一起探寻“沂蒙六姐妹”的英雄事迹。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即将打响,150多户人家的烟庄,成年男子都随部队上了前线,就连六七十岁的老汉也给解放军带路去了,村里只剩下了妇女和儿童。解放军为了创造歼灭七十四师的战机,主要的活动区域就在烟庄一带。由于部队驻扎和活动在附近,慰劳部队、安排食宿,需要有人张罗;区上派下来任务,也需要有人操办。当时村里留下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因腿有毛病,行走不便,而且乡亲们为躲避敌机轰炸,都疏散到山沟沟里去了,下个通知都要跑遍几座山,很多工作都无法完成。这种状况“沂蒙六姐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过大家合计,一致推举张玉梅当村长、伊廷珍当副村长,其他人分别担任文书、财粮员、公安员等职务。有了“沂蒙六姐妹”的张罗和组织,解放军到了烟庄,她们全部都办理得顺顺当当、妥妥帖帖。

有一天,区上来了紧急通知,要求烟庄村给解放军骑兵的战马准备草料5000斤。“六姐妹”都裹着小脚,伊淑英还怀着身孕,但是她们还是扛上秤、拿上账本翻山越岭,一道道山梁、一户户人家地进行动员,收齐草料之后再指挥着妇女们将一担担谷草、一袋袋豆料按时运送到指定地点。完成这项任务不久,她们又接到了在两天内将5000斤粮食加工成煎饼运送到前线的任务。当时全村除了军属和老弱病残,能烙煎饼的不过70人,两天内每人要烙70多斤煎饼,完成任务的艰巨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加快进度,“沂蒙六姐妹”除了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还主动包下了十几户军属的任务。烙煎饼期间,张玉梅一天没顾上吃饭,晕倒在鏊子边,醒过来喝了点水、吃上几口东西又接着烙起煎饼来;公方莲由于劳累过度,烙煎饼时打瞌睡手被烫伤了好几处,但她忍痛坚持把煎饼烙完。在“沂蒙六姐妹”的带动下,乡亲们加班加点、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把煎饼按时送到前线战士的手中。

1947年5月15日,天还没有亮,村里开进了一队解放军,担架队和伤员也随之到来。“沂蒙六姐妹”赶紧带领妇女们给伤员包扎伤口,给战士发慰劳品。部队驻扎期间,区上接连发了三道紧急通知,下达了5天做245双军鞋的任务。接到任务后,“沂蒙六姐妹”又带领烟庄村的妇女们拿起针线,争分夺秒地缝起了军鞋。冀贞兰在做鞋的时候,发现布不够了,就将自己正穿的衣服大襟撕下来做了鞋面。

孟良崮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沂蒙六姐妹”接到了往前线运送弹药的任务。她们带领着村里的妇女,冒着战场的炮火,二人一组抬着50公斤重的弹药箱,翻越20多里的崎岖山路,将弹药送到前方的炮兵阵地。她们还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部队转移,杨桂英4岁的儿子被炮弹震聋了耳朵。

据统计,整个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六姐妹”带领全村共计为部队烙煎饼15万斤,筹集军马料草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1947年6月10日,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她们的事迹,称她们为“沂蒙英雄六姐妹”。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

新中国成立后,“沂蒙六姐妹”依然坚持爱党拥军,除将自己的儿孙送到部队之外,还捐钱捐物慰劳子弟兵。2007年,“沂蒙六姐妹”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民政部、解放军报社评为全国“爱国拥军十大新闻人物”群体。2009年,一部以她们为原型的电影《沂蒙六姐妹》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在全国公映,再一次感动了全国观众。如今,虽然“沂蒙六姐妹”都已离开了人世,但是她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仍为人们所传颂,而且将一直传颂下去。